

JIAOYUXUESHILUNGANG

教育学史论纲

王坤庆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教育学
史
论纲』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史论纲 / 王坤庆著.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5351-2642-1

I. 教… I. 王… III. 教育学-历史-世界
IV. G40-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488 号

出 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电话: 83625580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通山县印刷厂 (437600·通山县通羊镇南市路 165 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4 插页 13.75 印张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0 千字

印数: 1—2 000

ISBN 7-5351-2642-1/G·2149

定价: 18.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导 言

我国已故著名教育理论家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一文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教育学史”方面的专著^①。本书是笔者尝试研究教育学史而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

按照人们的一般说法,近代西方教育学自夸美纽斯至今已走过 300 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众多教育学家,也形成了许多教育学派别,并且,这些学者的思想都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面对着历史上沉淀下来的教育学理论,我们较多的是在教育史学科范围内进行研究,如较多介绍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及其思想,而较少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教育学理论的历史发展规律。并且,教育史研究者眼中的教育学,往往关注的是孤立的单个的教育家的思想,很少从一系列理论发展的连续性进行系统考察,这样,很容易导致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了理论之间的相互联系。此外,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往往与时代的变更、相关学科理论的进步、科学观念的嬗变等有密切的关系,对这样复杂的背景与教育学发展的相关程度,人们以前也很少研究,它需要我们从更深刻的程度上揭示出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动力机制。即使是从教育学理论本身来看,不同的

^① 陈元晖:《中国教育学七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 年第 5 期。

体系结构、研究范式、价值取向,往往是教育学发展的标识。然而,我们也很少从教育学的构成形态和学科内在逻辑上去探讨其发展规律。因此,对教育学史问题进行研究,既是一个在学理上被长期忽视的问题,也是一个富有潜在研究内容的新领域,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教育学的科学理性的认识,更是丰富教育学理论、提高其学术地位的一种尝试,也即说,开展有关教育学史问题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对人类思维具有极强的挑战性。

从现实意义上讲,我国教育学发展至今,既取得了许多成就,更存在不少问题,自 80 年代以来人们对现存教育学所表现出来的批评、责难、非议就表明了这一点,甚至流露出些许悲观、失望的情绪。难道教育学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①我国教育学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表明人们在教育学的发展上将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然而,根据什么来选择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死守传统不行,全盘西化也不行,于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便成为人们重构教育学理论的许多尝试中的一种。教育学史研究正是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规律,为中国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某些启示或借鉴。因此,深入进行教育学史问题的研究,不仅是重建教育科学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对缓解中国教育学的危机,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尤其是处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

笔者于 1990—1991 学年度赴北京师范大学作访问学者,师

① 《教育研究》杂志 1995 年第 7 期发表吴钢的文章:《论教育学的终结》,表明人们对现存教育学发展前景的忧虑。此后,该杂志分别发表郑金洲的《教育学终结了吗》(1996 年第 3 期)、周浩波的《论教育学的命运》(1997 年第 2 期),对有关教育学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著名教育理论家黄济教授,在先先生的指导下,对“教育学史”这一研究课题进行了认真且不乏苦涩的探索,积累了相关资料,并撰写了部分论文发表。1994—1997年间,受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之邀,我承担了她所主持的“八五”国家级重点科研课题“教育学科的体系与发展研究”之子课题“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发展研究”,就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写成“20世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一书书稿。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思考,我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在“教育学史”方面的思考公之于众,以求同仁的指教与点拨。

本书试图在探索“教育学史”学科规范的前提下,以西方教育学史为依托,侧重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去讨论相关问题,不求体系的完整,只求对相关问题作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并结合分析中国教育学的现状,试探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道路。本书既区别于一般教育思想史著作,它主要从方法论角度研究教育学理论发展史,尽量避免史料堆砌和原文转述;又区别于一般教育理论著作,侧重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从历史角度观照对某一问题的研讨,将教育学相关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虑。

教育学史研究的问题很多,作为一本水平和容量都有限的专著,很难一一涉及,故本书采取选择“基本”问题的方式,以“论纲”的面貌出现,作一初步的尝试。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论述“教育学史”的基本学科规范,包括“教育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教育学史的学科性质以及它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等。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主体内容,侧重从史实的角度论“教育学史”。第三部分包括第八章、第九章,试图立足于史料去探寻教育学发展的规律,并期望能获得对我国教育学发展的一些启示。

如果说,人类过去对于教育学的探索是一种对于教育理想

孜孜不倦的求索的话,那么人类今天更多是面对现实的教育问题进行研究,而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对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刻思考。因此,笔者以为,治史不过是为了关照当代。作为初生之物,若本书能引起教育研究者对中国教育问题研究的某些兴趣或对相关的问题的争辩,将使笔者获得意外的惊喜。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教育学史”辨	(1)
一、元教育学的兴起	(3)
二、教育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7)
三、教育学史的性质	(13)
四、教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20)
五、教育学史研究方法	(26)
第二章 教育学的产生	(39)
一、何谓“教育学”	(39)
二、夸美纽斯教育学	(50)
第三章 “经验——描述”教育学	(65)
一、洛克教育学	(65)
二、卢梭教育学	(71)
三、启蒙思想家的教育学	(85)
四、泛爱派教育学	(87)
五、新人文主义教育学	(90)

六、裴斯泰洛齐教育学·····	(93)
第四章 “哲学——思辨”教育学 ·····	(99)
一、康德教育学·····	(99)
二、赫尔巴特教育学 ·····	(111)
三、赫尔巴特学派 ·····	(123)
四、贝内克教育学 ·····	(130)
第五章 “科学——实证”教育学 ·····	(147)
一、斯宾塞教育学 ·····	(149)
二、孔佩雷的教育科学 ·····	(161)
三、从威尔曼到拉依 ·····	(168)
四、实验教育学 ·····	(176)
五、教育研究科学化思潮的影响 ·····	(180)
第六章 “规范——综合”教育学 ·····	(194)
一、教育学价值取向多元化 ·····	(195)
二、“主义式”的教育学流派 ·····	(227)
第七章 “科学——人文”教育学 ·····	(255)
一、科学主义教育学派别 ·····	(256)
二、人文主义教育学派别 ·····	(276)
第八章 教育学发展阶段及其方法论启示 ·····	(313)
一、“范式”辨义 ·····	(314)
二、教育学发展阶段 ·····	(317)
三、教育学发展的方法论启示 ·····	(337)
第九章 教育学发展动力机制探寻 ·····	(352)
一、研究中心转移 ·····	(358)

二、学科分化的内部矛盾	(361)
三、教育学理论性质	(371)
四、现代科学的辐射	(375)
五、教育学知识增长——批判性思维	(386)
参考书目	(392)
主题索引	(401)
外国人名索引	(407)
后 记	(426)

第一章 “教育学史”辨

教育学是一门以研究教育现象、探讨教育规律为己任的学科;它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有自身的发展历史。早在 20 世纪初,英国学者亚当斯(J. Adams)就撰写了《教育理论演进史》(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ies, 1913)一书,探讨了自夸美纽斯以来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① 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孟禄在其主编的《教育百科全书》中,也将近代西方教育学说的演变概括为七大思潮的相继问世。^② 我国学者蒋径三在《西洋教育思想史》中认为,近代教育学史,主要表现为不同教育思潮更替的历史,据此,他将近代教育学说的发展,描述为人文主义、自然主义、泛爱主义、理性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理论流派的更迭。^③

上述情况表明,对教育学发展历程作纵向考察,并试图探寻其发展规律,是借鉴历史经验、推动教育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尝试。尤其在今天,中国教育学面临着新世纪的挑战,必须选择一条既促进学科理论繁荣、又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教育学发展道路,是摆在每一个期望对教育学作严肃思考的学人面前的

① 该书的中译本为余家菊译,并将书名改为《教育哲学史》,中华书局 1934 年版。

② 参见瞿世英编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第 26 页。

③ 蒋径三著:《西洋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艰巨任务。

纵观西方近现代教育学理论的演进,我们惊奇地发现:每当世纪交替的时候,人们对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关注似乎比平时要更加强烈:17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教育漫话》,几乎塑造了传统英国人的全部性格;18、19世纪之交,康德对教育的思考及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问世,构建了整个19世纪的教育模式;刚跨入20世纪的门槛,美国教育家杜威倡导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学理论,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世纪交替时刻对教育学理论格外关注的现象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是人们面临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对教育进行的一种选择。今天,当代中国正处于新世纪到来的前夜,回顾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教育的发展道路,我们同样面临着对新世纪教育的抉择。

因此,认真研究和总结自己的经验,批判吸收人类教育学理论遗产,使中国教育学在21世纪来临时,以崭新的面貌展示于世界,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个过程中,探讨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并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乃是改造和重构新时代教育学理论的重要一环。正因为于此,伴随教育学理论的元科学研究兴起,人们对推进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①

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人们呼吁建立跨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试图从“元教育学”高度透视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论文主要有:叶澜:《关于加强教育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3期;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3期;何齐宗:《建立“教育学史”刍论》,《教育研究》,1989年第8期。自1995年第1期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辟“元教育学讨论”专栏,对有关元教育学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

一、元教育学的兴起

“元教育学”(Meta-Pedagogy)兴起来自于元理论研究。“元”在英语中表示为“meta”,意为“在什么之后”、超越。它与某学科相联所构成的名词,意味着一种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具体说来,又可区分为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指这种逻辑形式具有着超验、思辨的性质(这源于“metaphysics”一词);另一层含义是,这种新的高一级的逻辑形式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及其他种种表现,这就是元理论。元理论以元数学(metamathematics)的崛起为先声。

元数学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 Hilbert)在其希尔伯特方案中提出来的。它试图把整个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便是数学的元理论。受其影响,元逻辑学诞生了。随后,陆续出现了元哲学、元伦理学、元美学、元科学等。此外,像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学等,虽未冠以“元”字,但具有元理论的性质,即都是有关理论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元理论家族。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在元教育学或元教育理论、或元教理学(metaeducology)的概念下构建元理论。^①本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分析教育哲学,被人们公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元教育学理论。然而,由于分析教育哲学偏重于对教育概念的澄清和梳理,故在元教育学研究领域影响不大,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交互影响下,元教育理论研究才在国外勃兴。德国著名教育学者布雷岑

^① 唐莹、瞿葆奎:《元教育学的兴起与展望》,《中国教育报》1993年8月12日。

卡(W. Brezinka)先后撰写了《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Von der Pädagogik zu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1971)、《教育学的后设理论》(Metatheorie der Erziehung, 1978)等著作,阐明他的元教育学观念。

布雷岑卡认为,元教育学是一种关于各种教育理论的认识理论。他强调,虽然人们常识性地认为,现存的教育学理论中的确充满了知识与谬误,但这需要检验,而检验又需要标准、法则和规范。因此,发现这些标准、法则和规范,精确地界定和证实它们,是元教育学的任务。这样,在元教育学研究中,人们必须从逻辑的和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评价教育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元教育学是用来分析和检验教育学理论的逻辑系统和工具。除了德国,元教育学研究在法、英、美、苏等国都有所反映。比如,法国教育学家米亚拉雷(G. Mialaret)曾著《教育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Educational Science, 1985),在认识论、结构、方法及范围方面对教育学进行了元理论分析。英国教育哲学家奥康纳(D. J. O' Connor)在其《教育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57)中,专门研究了教育学理论的性质,并认为,任何教育学理论总是包括着三种命题系统,即形而上学的陈述、价值判断的陈述和经验的陈述。他主张,只有经验的陈述(即那些能够在实践中被检验的陈述)才是教育学理论应该具备的基本性质。显然,奥康纳的这一观点深受分析哲学和英国传统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① 美国教育学家约瑟夫(S. L. Joseph)、马歇尔(J. D. Marshall)等人,曾在《教育哲学与理论》(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杂志连续发表文

① 参见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482页。

章,研究元教育学问题^①。特里·穆尔(T. W. Moore)则试图通过分析教育学理论的性质与结构,建构一种经得起检验并指导教育实践的教育学理论体系。

他指出:“一个有效的教育学理论,应当是这样的:它的关于目的的假定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它的关于儿童的假定是正确的和能核实的,它的关于知识的假定在哲学上是值得尊重的,以及它的关于方法的有效性是证实了的。”^② 苏联的盖尔顺斯基引进当代科学学的概念与范畴,着手建立教育科学学,以分析教育学知识的实际状况及性质、结构、作用等。^③ 当代一批日本教育学者痛感日本教育学仍然没有摆脱所谓“进口教育学”的困境,也致力于元教育学的研究,如村井·实、田浦武雄、冲原·丰等人。村井·实主张,就像当年亚里士多德把出现在“物理学之后”的关于“物理论学”的议论命名为“形而上学”一样,今天可以把出现在“教育学之后”的学说称作“教育论学”。^④

通过阅读相关材料和认真思考,我国有人将元教育学的研究范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⑤

(一)有关教育学曾经是什么的研究与教育学应该是什么的研究。它主要涉及教育学历史发展及其不同教育学理论之间的

① S.L. 约瑟夫:《教育理论的结构》;J.D. 马歇尔:《教育理论的性质》;J.D. 马歇尔:《教育理论与常识的概念框架》等。以上文章分别载于《教育哲学与理论》(英文版),1971年第1期,1975年第1期,1977年第3期。

② 引自[英]丹尼斯·劳顿等著:《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张渭城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③ [苏]盖尔顺斯基:《教育科学学》,载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29页。

④ 参见[日]大河内一男、海后宗臣等著:《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曲程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⑤ 参见唐莹、瞿葆奎:《元教育学的兴起与展望》,《中国教育报》1993年8月12日。

比较研究,通过历史回顾和比较分析,在事实研究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以选择今天教育学的发展道路。

(二)有关教育学内部关系的研究及教育学外部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教育学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诸如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教育学的理论性质,教育学的基本范式,教育学与其它学科的区别与联系,甚至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的异同等。通过这部分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种既在科学上符合逻辑,又在价值上符合规范的新型教育学理论。

(三)将教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认识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对教育学的界说不同,就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如作为语言系统的教育学、作为知识系统的教育学、作为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教育学和解释教育现象的教育学等,都有不同的特质和不同的结论,若对这类问题有所认识,显然是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四)从科学学的角度,若将教育学区分为作为哲学领域、作为科学领域和作为实践领域的不同形态的话,则可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探讨哲学教育学,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探讨科学教育学,从规范实践的角度探讨操作教育学等等。

总之,关于教育学的元理论研究在我国才刚刚起步,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一愿望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在自己所感兴趣,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做一点实质性的工作,以推动和繁荣我国教育学理论。基于此种看法,本书选取上述元教育研究方向中的第一个侧面,试图对教育学史中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探讨我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道路。

二、教育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教育学史”是一门以历史上的教育学理论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通过研究教育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探寻教育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繁荣教育理论提供历史借鉴。近年来,我国教育理论界许多人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理论这一目的出发,对“教育学史”的研究给予了重视。

按照目前人们的一般看法,近代教育学产生于17世纪,即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著的《大教学论》(1632年)问世为标志。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观点来看,作为以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史”,则是教育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最早出现“教育学史”这一名称是在19世纪中叶。1843年,德国教育家劳麦尔(K·G·Raumer, 1783—1865)写了本《教育学史——文艺复兴至现在》,20年后,英国人菲奇(L·W·Fitch)和帕金斯(F·B·Perkins)将该书译为英文,并简称为《教育学史》。解放前,我国学者也将其译为“教育学史”^①。

在“教育学史”研究上影响较大的是法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加布利尔·孔佩雷(Gabriel Compayré, 1843—1913)。1879年,他写了一本《法国教育学说批评史》,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法国教育家及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价,并试图以心理学为基础建立科学的教育学。1887年,孔佩雷的这本书被美国密执根大学帕里(W·H·Payne)教授译为英文,并改名为《教育学史》,

^① 唐钺、朱经农、高觉敷主编:《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17页。